

李玄伯与民国时期 古史研究的文化人类学路向

赵满海

摘 要: 李玄伯(1895—1974)是中国现代史学名家;其治史的理念,早先倚重于考古学,后转向文化人类学。这既得益于他早年文化人类学知识的积累,也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思潮密切相关,而催化剂则是他翻译古朗治《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时所获得的灵感:三代之世,去古未远,保存了若干初民社会的文化遗迹,在后世的文献中屡有体现,得自初民社会的文化人类学知识对于解释先秦时期的神话传说、生命礼仪、社会组织、亲属称谓、宗教信仰等问题颇有助益。此后,他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借鉴文化人类学知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亲力亲为,为上古史的研究补充新材料、提供新看法;还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对史学借鉴文化人类学的限度进行了深刻反思。值此历史人类学方兴未艾之际,深入研究李玄伯在借鉴文化人类学知识领域的成就,不仅有助于丰富我们对现代史学史的认识,对于当代的史学跨学科研究也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文化人类学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文化人类学的传入与经学研究的现代转型”(10DLSJ02)

作者简介: 赵满海,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曲阜 273165)

DOI:10.13613/j.cnki.qhdz.002705

众所周知,中国上古史研究在20世纪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得益于研究方式上的两种新取向:一种是凭借考古资料来解读传世文献史料中的难题,或直接来复原历史;另一种是借鉴文化人类学的观点与材料,为历史的理解、解释与评价提供类比研究的新证据。前一种研究方式,现今已成为上古史研究的主流取向,为学界普遍接受和重视;不仅涌现出众多以“新证”著称的论著,还出现了一些带有总结性的理论著作。^①后一种研究方式虽然也出现过一批以借鉴文化人类学知识见长的史学名著,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李玄伯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1941年)、杨宽的《古史新探》(1963年)等,但至今还处于上古史研究的“旁支”。不少学者对这种研究取向的合理性、有效性仍然心存疑虑。^②也许是得自世界各族的文化人类学知识与中国上古史缺乏直接联系,也许是先行者在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探索中出现过一些失误,所以这种研究模式尽管在西方史学界开展得有声有色,^③在中国上古史学界却难以取得进一步的突破,而原本它应有更好的发展前景。^④

本文以李玄伯的上古史研究为个案,讨论他在借鉴文化人类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对史学借鉴文化人类学的限度问题所进行的理论反思。李玄伯早年以《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1924年)

① 参见田旭东:《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冯胜君:《二十世纪古文献新证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

② 参见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203—204页。

③ 参见陆启宏:《历史人类学的不同路向:人类学的历史化和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学术研究》2016年第6期。

④ 参见仲伟民:《历史人类学:跨学科研究的典范》,《光明日报》第9版,2005年6月30日。

在史学界崭露头角,后凭借《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名重一时,获得了顾颉刚、徐旭生、齐思和等史学名家的高度评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再度兴起,《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在史学界的引用率居高不下,但从学术史角度研究该书成就的论文仅有三篇,即李培林的《李玄伯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徐韬的《李宗侗学术初探》和黄远东的《试析李宗侗古史研究成就——以〈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为例》,他们或详细勾勒李玄伯的生平,或分析李玄伯治学理念的转向及其原因,或讨论李玄伯在比较古史学方面的成败,但很少涉及李玄伯在借鉴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得失。^①然李氏治史的主要特色却是对文化人类学的高度认同与借鉴运用。由此出发,我们再来追问:李玄伯的治史重心为何能实现由考古学向文化人类学的转变?这种跨学科研究的尝试对传统经史之学有何突破?对今人来说又具有什么启示意义?这些正是前人缺乏深入研究而笔者试图加以突破的问题。

一、李玄伯治史理念之转变

1924年,针对“古史辨”论辩双方由于缺乏有力证据从而导致在许多争论中莫衷一是的情形,李玄伯发表了《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指出要想解决双方的争议,光靠“载籍”是不够的,还需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②“故宫盗宝案”发生之后,李玄伯蛰居上海,致力于翻译法国史学家古朗治的《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在译书过程中,他意识到东周社会与古代希腊、罗马有诸多可资比较之处,许多古老的历史之谜则可借助文化人类学而得以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写成的,李玄伯因此成名,可谓因祸得福。

在李培林看来,李玄伯治学理念之转向发端于对实证主义方法局限的认识。^③其实,这只是转向的一个缘由,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找到研究上古史的新工具,当然,这个新工具的获得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具备各种条件。

首先,他在法国留学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文化人类学知识。当时他有幸结识了法国学者葛兰言,准备追随其做博士论文,“后来因为家中催我回国而作罢”。^④葛氏的中国上古史研究独树一帜,其特点就在于不借助任何考古资料,仅凭借传世文献和社会学眼光就揭示出许多传统经师所没有发现的问题。^⑤李玄伯研究上古史的路数与此一脉相承,可谓葛氏的精神传人。其次,他在翻译《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时,“更取旧读之社会学民族学书重细阅之”。^⑥可见早在撰写《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之前,李玄伯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文化人类学知识基础。第三,当时国内方兴未艾的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思潮对他产生了直接触动。其时有不少中国学者开始借用文化人类学观点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如江绍原、陈顾远、夏曾佑、吕思勉、郭沫若、李安宅、冯汉骥、凌纯声、芮逸夫、顾颉刚诸人,就系统性而言当首推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史学风气“转向社会科学”。^⑦

① 参见李培林《李玄伯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见李培林、渠敬东、杨雅彬主编《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徐韬《李宗侗学术初探》,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黄远东:《试析李宗侗古史研究成就——以〈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为例》,《唐都学刊》2017年第1期。

② 李玄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现代评论》1924年第1卷第3期,第16页。

③ 参见李培林、渠敬东、杨雅彬主编《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下册),第853—854页。

④ 李宗侗《李宗侗自传》,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55—156页。

⑤ 关于葛兰言治学特色,参见杨堃《葛兰言研究导论》,见氏著《社会学与民俗学》,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126页;葛兆光《在历史与解释之间——对〈谷梁传〉定公十年“夹谷之会”记载的诠释史》,《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第1期,第6—7页。

⑥ 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史》“自序”,见《中国古代社会史》,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7年,第1页。这里所说的“社会学”“民族学”就是指今日学界常说的文化人类学。

⑦ 晋三:《中国近三十年来之史学》,《察省青年》1946年第4卷第3期。引自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16—117页。

李书成于郭著之后,且对郭沫若的观点与方法多有商榷。可见,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思潮也应当是导致李玄伯学术理念发生转向的思想来源之一。

留学之前的读书生活也为李玄伯积累了丰富的文献知识,^①法国求学的经历帮助他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人类学眼光。翻译《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激发了他整合史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灵感:三代之世,去古未远,保存了若干初民社会的文化遗迹,因此,得自初民社会的文化人类学知识对于解释先秦时期的神话传说、生命礼仪、社会组织、亲属称谓、宗教信仰等问题具有很大帮助。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史学的兴起则为他的学术转向提供了时代驱动力。

二、文化人类学与历史研究的契合

李玄伯在借鉴文化人类学之时,首先思考的是历史研究借鉴文化人类学知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中国自古就有“礼失而求诸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古之中华,今之夷狄也”的说法,也就是说后进民族中保存了一些先发展民族早期的史影。不过,古人更多地着眼于不同民族文化发展快慢的原因及其评价,近代以来的文化人类学家则借此发展出一套借助当代部落社会研究人类上古史的方法,即借助初民社会的知识解释人类早期历史文献中所保存的“没有意义的习俗”。^②该方法传入中国之后,对上古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广大史家进行类比研究的本体论基础。但很少人认真思考过这样的问题:何以确定当代部落社会保存的就是古代人类社会的“遗迹”?何以确定在二者之间进行类比的可行性?

在李玄伯看来,人类生理上的一致性导致了人类心理上的一致性,因此人类社会进化步骤有快有慢,但都有一个总的方向。现代人所能看到的原始民族的生活方式,正是我们自身祖先曾经的生活方式。就上古史研究而言,仅凭历史文献记载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借助得自我国周边少数民族的调查资料。^③

与他同时代有不少史家从事过类似的实践工作,多为直接借用人类学的某种理论与材料来解释中国历史,很少有人从本体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思考历史研究借鉴文化人类学知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④作为跨学科研究最早的实践者之一,李氏的取径与他人有所不同。他最初的工作是通过借鉴文化人类学知识,来激活传统经学的史料价值,而不是径直地套用某些理论模式去解释中国史事。

《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虽然以“新”著称,但并不刻意求新,书中不少地方通过借鉴人类学知识来印证传统经说,从而在肯定古代经师贡献的同时为其提供了更多的佐证。

如李玄伯援引多种人类学资料证明了经书所载部分内容的客观性。《孟子·滕文公上》借陈相之口表达了许行对滕文公的批评,认为贤者应该“与民并耕而食,凿井而治”。孟子通过与陈相的论辩提出了“劳心者”“劳力者”当各安其分的观点,广为后人传颂。李玄伯则借助一段人类学材料印证了陈相、许行观点自有其合理性。在北美克利克人(Creek)之中,每座城市有一位首领,具有一定的政治权力且受到人们的尊敬,不过他的衣服与常人相同,他和他的家族也须参加劳动,“这不即‘并耕而

① 参见李宗侗《李宗侗自传》,第32、65、72、73、74、77页。

② 凌郁恒雄编:《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文化室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6页。

③ 参见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史》,第1页;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北京:来薰阁书店,1941年,第1—2、53页。

④ 如李安宅的《〈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1929年)、冯汉骥的《中国亲属称谓指南》(1937年)、顾颉刚的《浪口村随笔》(1949年)等史学名著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1949年之后,顾颉刚阅读了大量人类学、社会学的论著,其思路又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史林杂识初编》(1964年)和《顾颉刚读书笔记》中多有体现,此问题留待另一篇文章详加论述。

食糗粮而治么?”^①儒家经典成书较晚,但经书中所记载的很多内容有可能反映出更为古老的原始社会的思想,陈相的观点从历史角度看自有其依据。通过李玄伯的举证,《孟子》一书在研究部落社会首领职责与地位的问题上的史料价值得以彰显。

如果说对《孟子》的分析佐证了经书在历史研究上的价值,对“叔姬待年于国”的举证则不仅证明了这段材料的可信性,还印证了后世经师对这一现象之功能解释的合理性。李玄伯引用了弗雷泽《图腾与外婚制》中的4条婚姻资料,说明部分初民社会中有“待年”的习俗,即家中年龄较小的女子等成长到一定年龄后嫁给她姐姐的配偶,这种现象与“叔姬待年于国”的记载当出于同理。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奇特的婚姻形态呢?人类学研究证明:在加利伯人中,几个姐妹从小生活在一起,感情深厚,在侍奉同一个丈夫时就能更好地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在李玄伯看来,这就是《春秋释例》所说的“参骨肉至亲所以息阴讼”。^②

近代以来,随着历史学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西方史家对直接史料高度重视,这种治学理念对国内学者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一大批善于运用甲骨文、金文以及其他考古资料等直接史料的史家迅速成名。传世典籍由于不属于这个行列,在这种主流观点的冲击下,其史料价值被极大地弱化了。^③李玄伯通过借鉴文化人类学知识,有力地激活了某些传统经书的史料价值,为丰富历史研究的路径做出了杰出贡献。

当然,对经学史料的新解读,目的在于通过借鉴文化人类学深化对历史的理解。这是李氏研究工作的第二步。一般认为,历史研究可以划分为对史实的确认与复原、对史实的理解和解释、历史规律的概括、对历史意义的评价等四个不同的环节。^④史实考订是基础,对史实的理解和解释则是深化历史研究的必由之路。

李玄伯多次指出,他要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说明其所以然”。^⑤文化人类学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国语·晋语》记载,秦穆公准备将怀嬴嫁给重耳作为笼络重耳的重要手段。由于怀嬴此前嫁过重耳的侄儿子圉,重耳内心非常矛盾:既希望与怀嬴结秦晋之好以获得有力的外援,又难以接受怀嬴曾经是自己侄儿媳妇的事实。司空季子深知重耳的顾虑,借用“今子于子圉,道路之人也”的理由,解开了重耳的心结。明明是叔侄关系,为什么说是“道路之人”呢?这只能用母系社会遗俗来加以解释。因为子圉的父亲夷吾与重耳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若从父系看,重耳与子圉属叔侄关系;若从母系看,则二人并不同姓,“自然是道路之人了”。^⑥以往万难理解的古籍便涣然冰释了。

此外,李玄伯对昭穆制度的探讨也很有代表性。昭穆制度是西周重要礼制之一,但古书中仅有零星的记载,杜预、朱熹先后做了一些字面的解释,仍然不清楚这种制度的实质。业师刘家和先生读过这些注解后仍然不惬意于心,后看到李玄伯用澳洲婚级制度解释昭穆制度后豁然开朗,认为“这是一条解决此问题的最佳之路”。^⑦此后学术界出现了诸多探讨昭穆制度的论著,大凡涉及昭穆制度的起源、过程、实质、功能等问题时,文化人类学知识往往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对于这一研究思路的形成,李玄伯有凿空之功。

如上所述,历史研究的第四个环节是对史事的评价,这也是李氏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李

① 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第137页。

② 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史》,第149页。

③ 关于民国时期中国史学界在西方学术影响下史料观的剧变,参见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谰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④ 参见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增订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53页。

⑤ 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第251页。

⑥ 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第101—103页。

⑦ 李衡眉:《昭穆制度研究论集》刘家和“序”,济南:泰山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氏认为,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传统史学对经籍的评价与史实往往存在不小的偏差,文化人类学的引入有助于史家更为客观地评价历史事实。五经本为先秦古书,是反映上古历史的重要史料。随着“经稟圣裁,垂型万世”观念的产生,这些古籍成为宣扬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为了履行其政治职责,古人往往需要根据现实需要对这些经典作出新的解释,这些解释在部分地实现了其社会功能的同时,往往背离了这些典籍的原始含义,也背离了历史本身。

文化人类学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其从业者致力于寻求制约人类行为的普遍规则和实现跨文化的沟通,倡导文化相对主义,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理解。李玄伯在研究古史的过程中,很好地实现了文化人类学的这种研究意图,对不同时代文化现象也做出了更为客观理性的评价。他对“中国古代婚姻史”的研究足以说明这一点。

根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的新君即位后可以娶其庶母,即古书中经常说的“烝”,后代的经师往往将这类现象定性为“淫”。如《左传·桓公十六年》杜预注曰:“上淫曰烝”,孔颖达疏曰:“训烝为进,言自进与之淫也”。^①

李玄伯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左传》将社会所不认可的性关系称之为“通”,而将上述社会所认可的性行为称之为“烝”。为此他曾借用加都人的资料加以佐证,“烝报是公开且合法的举动,而转适子辈须听其舅,尤能说明昭伯不欲,齐人何以强之,盖此事并不由男方而须听女家之意也”。^②

梳理历史文献,李玄伯对“烝”与“通”做出了明确区分,又通过与文化人类学资料的对比,揭示了这种现象的世界性意义,从而剥离了后代经师附加在儒家经典上的、充满道德说教色彩的非历史的解说,使得我们的认识更加逼近历史真相。

当时其他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1941年,童书业与卞达人合写的《中国上古的婚姻与恋爱》一文,曾将春秋贵族阶层的“烝”制(有些论著中称之为收继婚)表述为“非礼”的通奸乱伦一类行为。童著《春秋史》似乎也倾向于将其此类关系定性为“非礼”。新中国建立后,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明显变化,已将收继婚视为一种制度并深入分析了它与父家长制家庭及财产继承制度的关系。^③ 相较而言,李玄伯更有先见之明。

三、历史研究借鉴文化人类学知识的限度

在《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这部史学名著中,李玄伯不仅提出了对上古史的诸多新解释,而且对如何合理地运用文化人类学成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反思,这在那一代人中是极为罕见的。

从学术史上的经验教训来看,历史研究在借鉴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最忌讳的是摘引个别的结论、个别的论断,而不是从整体上去领会把握某个学科的研究状况。尤其像文化人类学这种新兴学科,流派繁多,诸说纷呈,它原是提供各种试错性的解释,并非“定于一尊”的结论。这就需要史学工作者对这一学科具有足够的了解,对那些特定问题在该学科发展史上的来龙去脉有系统的把握,才能在具体问题上形成自己的判断。

李玄伯在《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与《中国古代社会史》两书中引用过古典进化论、文化传播论、历史特殊论、结构—功能主义、法国社会学学派等各种流派的想法。著名人类学家杨堃认为李玄

① 顾颉刚:《浪口村随笔》,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8页。

② 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第275、281页。

③ 参见胡新生:《童书业先生与先秦史研究——任教山东大学期间历史观的转变和历史创新》,《文史哲》2011年第5期,第159页。这段材料由胡新生提供,在此谨致谢意。目前仍有部分学者将此类行为与通奸行为混为一谈,见王力主编《王力古汉语字典》,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656页。

伯对于人类学文献“相当的熟悉”。^① 齐思和认为李玄伯既熟悉文化人类学进展,又能驾驭中国上古史资料。^②

学养渊深有助于史家在取材方面的择善而从,李玄伯对摩尔根和罗维的分析充分体现了一位优秀史家的功力和见识。摩尔根是古典进化论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他对亲属称谓的研究开辟了人类学界的新领地。但那时毕竟还处于人类学的起步阶段,调查技术、学术规范还不够成熟,调查范围十分有限,其研究取向具有浓厚的哲学思辨色彩。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摩尔根力图确立一些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固定模式。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摩尔根提出了不少缺乏坚实证据的假设,并以这些假设为基础推导出很多宏观的结论。

这种哲学化色彩极为浓厚的研究取向招致美国历史特殊论学派的强烈批评,罗伯特·罗维是这一流派的重要代表。为了批评《古代社会》,罗维写了一本《初民社会》,该书放弃了勾勒人类社会普遍模式的企图,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具有多种可能性,强调求异的风格非常明显。

对于这两种截然不同、各有利弊的治学风格,李玄伯有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发途径虽然不能完全一致,但是有一个趋同的总方向,进化速度也不一样。摩尔根过分偏重大同,忽略小异,“因此他所理想的人类进化过于整齐”,罗维则走向了另外一个反面。李玄伯的研究策略是在折衷之后,“用初民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大同的地方相比较”。^③

尽管李玄伯偏重于采信古典进化论的某些观点,但并没有因此而忽略该学派的缺陷,这一点还是难能可贵的。

如上所述,文化人类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是各种试错性的解释,那么历史学者借鉴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分析历史问题,就存在着一个他学科的“理论”与本学科的“材料”互相验证的问题。借用文化人类学理论成果来研究中国上古史,既是一个用“理论”来解释“材料”的过程,也应该是一个用“材料”来检验“理论”的过程。忽视或全然不顾后一个过程,那就会硬套理论、委屈史实,实在是误用了文化人类学的知识成果。早期的上古史研究,往往存在着这个毛病,而李玄伯较早就对这种错用、误用文化人类学知识的问题进行了反思与批评。

摩尔根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观察到,初民社会的亲属称谓与欧美社会的亲属称谓存在着巨大差异,并且提出借助亲属称谓重构人类婚姻形态发展史的方法论。郭沫若将这个思路运用到中国上古史研究,认为借助卜辞“多父”可以“证明商人仍在亚血族婚阶段”。在李玄伯看来,这种仅凭亲属称谓就来确定古代的婚姻形态的方法是不可取的。如汉晋人尚称叔侄为父子,难道“能以此就说晋人尚在亚血族婚阶段么?”卜辞中“多父”等于诸父,与作为亲子关系的“父亲”具有不同的内涵,不可相互混淆。所以要想证明商代处于亚血族阶段,“尚须其他佐证”。^④

在时人看来,郭沫若所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创立了史学研究借鉴文化人类学的新范式,但是他对外来理论时借鉴多而批判少,倘若他能够用中国历史去检验摩尔根的学说,而不是拿摩尔根的学说去附会中国历史,效果会更好。^⑤ 比较而言,《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的出版,标志着史家在借鉴文化人类学知识方面更趋成熟,他们不再满足于为国外人类学理论提供中国例证,而更多地致力于寻求符合中国历史实际情况的人类学理论学说,这对于今日如何合理地借鉴国外社科知识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① 杨堃《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中法汉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6年第二号,第126页。

② 参见齐思和《现代中国史学评论——掌故派与社会学派》,《大中》1946年第1卷第1期。转引自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240页。

③ 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史》,第276页。

④ 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史》,第135页。

⑤ 陈润成、李欣荣编《张荫麟全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11、1212页。

李玄伯在借鉴文化人类学知识之时,不仅能正本清源,选择更为合理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即使选定一种人类学理论,在处理历史问题时仍然能坚持实事求是,而不是勉强以史料迎合某种理论。

为了证明中国古代存在过图腾社会这个观点,李玄伯格外注重寻找古书中有关始祖神话的相关记载,如《诗经》中有关姜嫄“履帝武敏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载,因为这些记载有助于印证他的观点。其实,除《诗经》之外,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保存了更多此类记载,伏羲、黄帝、炎帝都有类似的经历,“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长于成纪,蛇身人首”。“有螭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正妃,游于华山之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黄帝)母曰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五月,生黄帝于寿丘”。这些资料与上述《诗经》中材料非常相似,但是李玄伯却没有使用这些材料,因为这些材料“甚难分辨真伪……不加批评而轻信,只以其‘言不雅驯’,就信为确系初民的,这是极危险的事”。^①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侧重以中国古籍附会古典进化论,“苟有不合,斥为伪书。苟足以圆其说,则皆可信”。“所谓《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者,不过以古籍为外人之学说作疏证而已,此其所以为时人讥也”。^②

二者相较,李玄伯不愧是一位孜孜求真者,虽然极力要证明一个观点,但即使看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时,仍然采取一种非常理性的、审慎的态度,这种精神无疑也是值得今人继承的优良学风。

余 论

中国上古史研究在很长时间里主要依靠残缺不全且真伪并存的传世文献,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学者们发现了数量更多且更接近历史现场的直接史料,但这些史料本身是不系统的,而且不能自明,所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历史研究的困境。文化人类学以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注重整体观念,推崇参与观察,其从业者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完整的社会,据此得出的各种理论往往可以在其他社会里得到验证或证伪。由于这些社会在生产水平、社会形态、思想观念上与人类上古史比较接近,如果运用得当,文化人类学对于深化历史研究可以大有作为。

然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在何种程度上、何种范围内可以为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提供类比的资料、提供解释的参照,这就要冷静、理性地考虑历史学在借鉴文化人类学之时的限度问题,也是跨学科方法所面临的普遍难题。深入研究包括李玄伯在内诸多跨学科研究者的学术成果,体会他们的思考探索及其经验与教训,不仅有助于丰富我们对现代史学史的认识,对于今日从事跨学科研究的史学工作者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匡 云)

^① 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第108页。

^② 沅思:《近代古史研究鸟瞰》,《国专季刊》1933年第1期。转引自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367页。在笔者看来,起步阶段,难免粗疏。沅思对郭著的评论略显刻薄。

ABSTRACTS

Structuring , Ritual Marker and Backward Observation from Now——Three Keywords in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in China

Zhao Shiyu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n Chinese society , scholars have gradually put forward some concepts , such as *structuring* by Helen Siu and Liu Zhiwei , and ritual marker by David Faure , which to some extent represents a sort of self-consciousness in scholarship. If we regard the structuring as the object of study , the ritual marker as the entry point , the term backward observation from now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certain methodology. Based on such self-consciousness in scholarship , a new pi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could be drawn.

When History Approaches Anthropologists—— Review on Helen Siu's *Tracing China: A Forty 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 in South China*

Zhang Xiaojun

Helen Siu , a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at Yale University , distilled forty years of field research into a coherent personal narrative in book form. The book applies a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o the study of South China. She used her field observations to illuminate key issues in anthropology , history and literature , such as culture , history , power , place , human agency and structuring. The review teased out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Siu's work by reviewing a dozen of her essays included in the book. It hopes to illustrate how Chinese anthropology and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intertwine productively to impact a range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Li Xuanbo and the Cultural Anthropological Orientation in Research on the Ancient History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ao Manhai

Li Xuanbo (1895 – 1974) was distinguished in the research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s historical views shifted from relying on archeology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e transition benefited from Li's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early years and the social scientific trend of historical research from the 1920s to the 1930s , and the catalyst was the inspiration from translating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social studies: the knowledg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on the primitive society contributed to interpreting some problems as the myths and legends , rites of life , societal organization , kinship terminology , and religious belief in the pre-Qin period. Li not only mad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of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the reference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proposed some new ideas and replenishing new materials to the research on ancient history but also made a profound reflection on the limitation of the reference from the height of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It will not only help to enrich our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 but also bring profound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contemporary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f historiography to explore Li Xuanbo's achievements in the reference to the knowledg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on the occasion of the burgeoning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 Milestone in the Study of the Ming Governmental Finance——The Review of Wan Ming and Xu Yingkai's *Mingdai Wanli Kuaijilu Zhengli Yu Yanjiu*

Shen Bin , Liu Zhiwei

The Wanli Kuaijilu is a national fiscal record edited by the Ming household department in 1582. *The Ming-*